

【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

人类文明形态的构成要素与发展过程

——兼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刻内涵

秦 宣 俞佳奇

【摘要】在求解人类文明形态发展过程的问题中,对主体社会形态、经济社会形态、技术社会形态、交往社会形态等有机统一的多重维度分析,可以立体呈现阐释人类文明形态的外部视角。通过内外视角的探查,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表现为:准确把握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基本要素及其矛盾运动,准确把握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具体要素的紧密联系,准确把握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现实存在形式;正处于由物的依赖性文明加速转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相较于资本主义文明日益展现明显优势、工业文明发展演进至数字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世界文明多样性深度融合的阶段。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形态构成要素;文明形态发展过程;社会形态

【作者简介】秦宣,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俞佳奇,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出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京),2023.5.43~5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23JZDZ037)的阶段性成果。

“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2021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此后,国内学界对其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产生了不少高质量研究成果,但也凸显出学理阐释不够等问题。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①,必须大胆进行理论创新。为此,必须继续深化和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学理阐释,依靠哲学社会科学提供逻辑严密、系统全面的科学论证。对此,习近平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②。而要从核心问题域出发,完成这项极其紧迫的基础性学术任务,离不开对人类文明形态构

成要素与发展过程两大基本问题的科学把握,即离不开对人类文明形态由哪些要素构成,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哪些文明形态、至今仍然存在哪些文明形态等问题的探索和回答。只有立足于唯物史观,批判性反思国内外文明研究学术史,才能得出人类文明形态构成要素与发展过程的一般性结论,进而为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刻内涵、理论逻辑、历史逻辑提供有效的知识供给。

一、人类文明形态的构成要素

作为文明研究的基础理论议题,人类文明形态的构成要素是学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亦是厘清人类文明新形态科学内涵的基本前提。从对学术史的梳理来看,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理论探讨,且有关文明

要素的界定可谓众说纷纭,但就其研究视野与路径而言,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侧重于辨识城市、文字、金属等物质性指标,代表性观点有文明的“三要素说”“四要素说”“五要素说”等。例如,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首倡、经由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推广的“三要素说”认为,城市(5000人以上)、文字以及复杂的礼仪中心是判断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准要素;夏鼐将礼仪中心归入城市,提出国家、城市、文字、金属的“四要素说”;李学勤在认同“三要素说”的基础上,主张增加金属使用的“四要素说”;徐苹芳将文字、城市、复杂的礼仪中心、青铜器铸造以及国家的出现等归纳为“五要素说”;等等。^③另一类侧重于考察社会分工、社会秩序等非物质性指标,代表性观点有文明的“秩序论”“分工论”等。如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提出,文明是“至少足以解决一个复杂社会的秩序、安全和效能的某些问题”^④的发展阶段;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认为“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它包含“经济的供应、政治的组织、伦理的传统及对知识和艺术的追求”^⑤;等等。

前一类研究力图运用最具代表性的物化载体论证人类文明形态的构成要素,这是学界将古代文明考古发现的实证材料进行简单提炼与排列所得出的结论,属于考古学的学科范畴。此类专注于“博物馆清单式”的传统做法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第一,某些要素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缺少冶金术的中美洲玛雅文明、未使用文字的南美洲印加文明等人类文明形态无法被纳入上述“要素说”的解释之中,这类解释很难适应人类文明广袤无垠而又变化多端的实际情况;第二,将人类文明形态人为地割裂成部分要素的抽离与组合,并没有从理论上说明上述“要素说”所涉及的要素为什么可以作为人类文明形态的要素,而未涉及的要素为什么不可以作为人类文明形态的要素,以及各类要素彼此之间存

在何种内在联系,这不但难以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出现作出结构特征性说明,更无法对人类文明形态形成及演进过程作出应有的解释;第三,究其本质而言,以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为依据的“三要素说”是各式各样“要素说”的理论原型,这类解释充其量仅为部分文明形态所共有。这种将发轫于西方的理论观点看作判别人类文明形态的普遍标准,容易遮蔽人类历史上各大文明不尽相同的发展历程,不可避免地隐含着西方中心主义以自身为历史原点的理论视角及其价值预设。后一类研究将人类文明形态的构成要素置于社会结构的总体格局和发展进程中,是学界对人类文明结构进行整体追溯和全面把握所得出的结论,属于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范畴。这里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实质性问题包括:相关理论模式的构建究竟能否说清人类文明形态由哪些要素构成;在人类文明形态的诸多要素中,哪些属于具备全局意义的基本要素,哪些属于非基本要素;是否需要区分原生要素和派生要素;等等。

综合上述认识,考察人类文明形态的构成要素,应当重视物质性指标和非物质性指标的有机结合,既通过文明遗存的实证材料揭示人类文明形态构成要素的物化表现形式,又借鉴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关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阐释思路,揭示人类文明形态构成要素交错存在、相互作用的基本关系,这是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正确理解人类文明形态内部构成要素及其整体联系的科学方法。就此而论,借鉴吸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研究成果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文明形态的构成要素这个问题上作出过重要回答。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⑥在恩格斯看来,分工、交换、商品生产是考察人类文明形态的三个要素,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

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马克思、恩格斯曾对文明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思考,涉及文明的起源、发展、类型、前途等重大问题。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认识,笔者认为,理解人类文明形态的构成要素需要学界解决尚未触及的棘手难题,在普遍的原理层面达成共识,主要涉及如下方面。

第一,人类文明形态构成要素具体有哪些?摩尔根指出:“人类必须先获得文明的一切要素,然后才能进入文明状态。”^⑦因此,摩尔根在论述人类社会阶段时,运用追根溯源的逆向思维方式,先后列举了文明起源过程中的近50种文明要素,其中野蛮社会初级阶段存在氏族联盟等十种要素、中级阶段存在制造青铜等20种要素、高级阶段存在诗歌创作等近20种要素。^⑧恩格斯继承前学,历数了“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全盛时期”古希腊文明中的十多种要素——“发达的铁制工具、风箱、手磨、陶工的轳轳、榨油和酿酒、成为手工艺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用方木和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设塔楼和雉堞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⑨。上述诸多要素的列举从特定历史背景出发,对人类文明形态构成要素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给予了具体而微的历史解释,并初步蕴含着理解人类文明形态构成要素的两个基本尺度:其一,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尺度中,采石、冶铁、制器、养殖、种植、建筑等要素意味着人类开始摆脱被强大自然力量束缚的状态,能够逐渐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不断增强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力量,这意味着人类物质生产的不断进步;其二,在人与人关系的尺度中,创作文学艺术、构建政治组织、发展城市生活等要素意味着人类开始摆脱异己社会力量束缚的状态,能够逐渐认识和把握社会规律,朝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迈进,这意味着人类精神生产的不断进步。换言之,由于观察视窗、研究路径等客观差异,仅在数量上为人类文明形态构成要素具体为何的问题下一个清晰有效、无可争

议的论断难免存在漏洞,但这并非意味着人类文明形态的构成要素无法被客观认识,站在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的视角,相对客观的路径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尺度对应生产力要素,人与人关系的尺度对应生产关系要素,二者统一于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并且与随之变化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紧密联系,共同塑造着人类文明形态构成要素的基础结构,决定着人类文明形态的兴衰更替。正是意识到文明要素在基础结构上的一致性,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指出:“无疑,每个文明都可能被民族化。每个民族或每个国家文明都会呈现出特有的面貌。但是构成文明最本质的要素,既不是某个国家的也不是某个民族的事物”^⑩。因此,尽管就特殊性来说,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理环境的文明形态在构成要素的具体体现上无法穷举甚至大相径庭,但就普遍性来说,人类文明形态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基本要素构成,是较为公允的认识。

第二,人类文明形态构成要素之间是何种关系?由于人类文明形态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基本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在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上述基本要素表现为诸多具体要素相互关联和彼此影响的复杂结构,如何认识具体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学界讨论较多的问题。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在研究法国文明史时,曾提出法国的两重性在于“文明的两种主要的要素在那里以紧密的配合发展着”^⑪。他力图探索欧洲文明萌芽时期“一些原始的和主要的因素”^⑫,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蕴含了在人类文明形态构成要素相互关系中区分主次、辨别轻重的问题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摩尔根重点列举了野蛮社会走向文明社会先后生成的六种要素,即制陶术、饲养动物、种植作物、建筑房屋、冶铁技术以及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⑬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摩尔根提及的六种要

素大都作过肯定性的概述,比如,恩格斯突出强调铁矿冶炼与拼音文字两种要素在文明形成前夕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中的关键作用,并将之简要概括为“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⑧。尽管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明确分析或比较诸多具体要素在人类文明形态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地位、作用及其关系,但如果加以抽象,他们所提及的六种要素直接关涉经济要素、文化要素,间接关联社会要素、生态要素,这足以说明人类文明形态构成要素之间不是孤立静止的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关系。推而言之,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⑨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可以得出结论:在基本要素的展开形式上,人类文明形态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种具体要素组成的严密有机整体,各个方面的要素以特定方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整合,推动着人类文明形态的运动、变化和发展。

第三,人类文明形态构成要素呈现何种变化趋向?由人类文明形态的要素结构推导可知,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要素以一定的形式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国家的产生是文明社会形成的最终标志,恩格斯在分析雅典国家产生时,将贵族、农民、手工业者三个阶级的划分视为“新的、悄悄发展起来的社会要素”^⑩,充分肯定了新社会要素的重要意义。这不仅直接表明新社会要素是文明社会形成的积极因素,还在宽泛意义上说明人类文明形态的生成与其构成要素的变化相适应、相匹配、相契合。马克思晚年在对摩尔根《古代社会》做摘要时,曾将摩尔根提出的“财产已经成为逐渐改造希腊制度而为政治社会开辟途径的新要素,这个要素既是政治社会的基础,也是它的主要动力。完成这样一个根本的变革,从现代的眼光来看是多么简单明了,在当时却是一件艰巨的任务”^⑪概括为“财产成

了逐渐改造希腊制度的新要素,准备了这种变革;在完成这种变革以前,曾试图在氏族基础上加以实现,历时数百年”^⑫。在这里,经济要素的变化引发政治要素的变化,物质文明变动成为政治文明发展的坚实基础和驱动力量,其背后的逻辑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人类文明形态构成要素之间存在内部张力和矛盾运动,不断发展变化的新要素满足和适应新的时代、滋养和创造新的文明,与这些变化要素相关联的其他要素也会有所改变,而后人类社会某一领域创造的文明形态会扩散至人类社会的其他领域,最终呈现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多重面相逐渐丰富的过程,从而推动人类社会整体文明的进步。因此,人类文明形态构成要素的变化趋向存在两种方向:当各个文明要素相互作用达到和谐状态,就能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反之,某个文明要素发展滞后或某些文明要素之间发展失衡,就会制约和冲击其他文明要素,造成文明要素系统运行紊乱,影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健康发展。

二、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过程及其分类

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是马克思、恩格斯从事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方法。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⑬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哪些文明形态、至今仍然存在哪些文明形态,是思考和研究人类文明新形态必然遭遇且必须回应的问题。在学界的持续追问中,不同学者基于各自的问题视域、思想方法和认识工具,归纳梳理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的文明形态,形成了旨趣各异、表达有别的各种文明理论学说,呈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学术景观,为拓展和推进人类文明形态的学理分析开辟了巨大的空间。但由于人类文明形态所涉及的时间跨度长、涵盖范围广,关于

人类文明形态历史生成及其现代转型的理论解答,面临着言人人殊的重重困境。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影响力较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俄国思想家尼·雅·丹尼列夫斯基开创了“文化历史类型”理论,认为人类文明的十种类型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依次是:埃及,中国,亚述—巴比伦—腓尼基、迦勒底或古闪米特,印度,伊朗,犹太,希腊,罗马,新闪米特或阿拉伯,日尔曼—罗曼或欧洲。(墨西哥和秘鲁是因暴力灭亡而未发展完成的美洲文明的两种类型)。^①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提出文明的多线发展论以替代单线演化论,认为世界上存在八种主要文明:古典、西方、印度、巴比伦、中国、埃及、阿拉伯、墨西哥。^②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经对人类文明形态进行过21种分类:西方、东正教—拜占庭、东正教—俄罗斯、伊朗、阿拉伯、古印度、远东、中国、朝鲜—日本、希腊、叙利亚、印度、米诺斯、苏美尔、赫梯、巴比伦、埃及、安第斯、墨西哥、尤卡坦与玛雅^③,认为当今世界只存在五种文明,即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中国文明)^④。美国人类文化史学家菲利普·巴格比认为,文明的主要单元已被清楚界定和普遍接受,世界主要文明有九种(或可能是11种)成员,即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古典(包括希腊罗马)、秘鲁、中美、西欧、近东,11种是在九种的基础上增加日本和俄罗斯。^⑤美国历史学家马修·梅尔科认为,斯宾格勒、汤因比、克罗伯、巴格比等比较历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12种文明的共识,其中有七种是已消失的文明,即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其中五种延续至今,即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⑥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运用空间框架讨论人类文明形态,重点识别了九种文明,即伊斯兰文明、非洲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海上远东文明(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等)、日本

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俄罗斯文明。^⑦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将人类历史分为中东统治时代、欧亚文明均势时代、西方统治时代三个阶段,其论述涉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小亚细亚和克里特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欧文明、美洲文明、俄国文明等文明形态。^⑧塞缪尔·亨廷顿在回顾人类文明形态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秉持存在七种或八种现存文明的观点:七种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八种即在七种的基础上增加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⑨梁漱溟在东方化还是西方化的观察与考察中重点比较了西洋文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⑩

上述学者关于人类文明形态发展历程及其分类的诸种学说极大地拓宽了人类文明形态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视野,对于我们研究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有助于我们运用更为均衡、更为客观的视角来看待人类文明形态的丰富内涵。但问题在于,上述论述存在两个方面的薄弱之处:一方面,多数学者在人类文明形态的总数方面各执一词,比如,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曾发生过中断,伊斯兰文明出现较晚,日本文明、犹太文明难以确认是否可以单列出来,等等。这些问题导致部分研究滞留于以简单直观的形式描述人类文明形态的现象观察层面,并未走进索解人类文明形态规律性认识的理论深处。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皮季里姆·索罗金在批评汤因比的文明理论时曾指出的,由于汤氏将文明理解为众多彼此缺乏因果联系的社会文化体系,其理论大厦如同“建造在沙滩之上”^⑪,这种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当超越数量之问而触及人类文明形态划分标准的时候,模糊不清且指向未明的标准不仅导致学者之间难以对话,还容易诱发理解文明的意识形态冲突,例如按照不同国家进行分类可能掺杂地缘政治博弈的色彩,按照民族进行分类可能陷入种族问题激荡的漩

祸,宗教分类与民族分类、国家分类交缠错杂,等等。这些引起争议的问题充分显示,人们围绕划定人类文明形态的标准这一问题远没有形成共识。因此,笔者认为,在认识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哪些文明形态、至今仍然存在哪些文明形态时,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究竟怎样理解人类文明形态的划分标准,以及不同的解释标准在理解人类文明形态时存在哪些异同之处。离开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讨论,就难以科学地理解人类文明形态历史与现实相交错的发展过程。

笔者的理解是,按照最具共识的看法,民族、国家、地域、宗教、文化等视角均构成考察人类文明形态的重要指标,马克思、恩格斯也曾按照民族、国家、地域等不同维度划分人类文明形态,他们不仅阐释了人类文明形态具体展开的历史语境,而且在更深层次上解决了人类文明形态按照怎样的轨迹运行、从而论证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处在这条轨迹的什么位置等根本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看来,由于文明形态与社会形态存在不少交叉重叠之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文明形态与社会形态理解为人类社会同一进程的两种观察角度,因此,理解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过程不得不还原至社会形态的问题场域。换句话说,理解人类文明形态还必须回到马克思,从社会形态的维度去把握。

第一,从主体社会形态看,人的发展状态构成人类文明形态的判断标准。马克思认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④因此,从理论上说,主体社会形态的发展阶段对应着人的依赖性文明、物的依赖性文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文明,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文明都属于人的依赖性文明形态或物的依赖性文明形态,至今人类文明仍然是物的依赖

性文明,或者说正处于物的依赖性文明转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文明的过渡形态。

第二,从经济社会形态看,生产关系性质构成人类文明形态的判断标准。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⑤此后,经过列宁、斯大林等人的理论阐发,“历史上生产关系有五大类型: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⑥成为经济社会形态划分的教科书界定。因此,从理论上说,主体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分别对应着原始文明、奴隶文明、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原始文明、奴隶文明、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至今仍然存在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

第三,从技术社会形态看,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技术工具和产业体系构成人类文明形态的判断标准。马克思认为:“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⑦,他还提出了“游牧民族”“渔猎民族”“农业民族”“商业民族”等概念,这其中体现的正是技术社会形态的思想。因此,从理论上说,技术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分别对应着渔猎文明、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商业文明、工业文明等,而且伴随着技术进步,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渔猎文明、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商业文明、工业文明,至今仍然存在农业文明、商业文明、工业文明。

第四,从交往社会形态看,交往程度构成人类文明形态的判断标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创了民族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广阔空间,“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促使“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迅速替代原先各民族、各地区相互割裂的偏狭状态。^⑧因此,从理论上说,交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分别对应着封闭文明、半封闭一半开放文明和开放文明,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封闭文

明、半封闭一半开放文明和开放文明,至今仍然存在半封闭一半开放文明和开放文明。

综上所述,在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特性,因此,人类文明谱系上呈现出多样性的文明形态。正如习近平所说的:“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⑧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刻内涵

梳理和回顾学术史可以发现,从构成要素看,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基本要素及其展开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具体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变化趋势,逐步打开了理解人类文明形态的内部视角;从发展过程看,主体社会形态、经济社会形态、技术社会形态、交往社会形态等有机统一的多重维度,立体呈现了理解人类文明形态的外部视角。内部与外部彼此呼应、贯通一体,是判断人类文明形态“新”与“旧”的综合性视角,是深究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的重要方面。

第一,就人类文明形态构成要素的三个问题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人类文明新形态准确把握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基本要素及其矛盾运动的现实存在形式。人类文明形态的基本要素是贯穿文明形态发展过程始终、将一定文明形态与其他文明形态区分开来的特殊要素,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具有一致性。因此,从新的历史方位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⑨,实质上构成人类文明形态基本要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殊表现形式,并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规定中心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聚焦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坚持推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内在统一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生产力不断发展、日趋平衡的基础上努力解决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应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中由“应然”走向“实然”。正因如此,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⑩。

其次,人类文明新形态准确把握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具体要素紧密联系的现实存在形式。人类文明形态的具体要素是基本要素的展开形式,在一定文明形态发展的不同阶段占据不同地位、呈现不同形式、发挥不同作用,并以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整合的形式推动人类文明形态变化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程中,强调“人口规模巨大”,突出人口资源的自然禀赋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石,即具有蓬勃活力与无限潜力的超大人口体量作为主体性力量,可以有效协调、合理运用人类文明形态具体要素,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建立在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的全部实践活动和丰富实践基础之上;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归根到底是将人类文明形态具体要素配置的整体效能转化为全体人民共享文明成果,折射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将全体人民平等纳入财富创造与分配体系的理念;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适应经济要素与文化要素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凸显人类文明新形态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不但追求物质富足,而且在更高层次上追求精神富有,积极创造高度丰裕的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展现出诊治并克服文明形态单向度发展弊病的全新面貌;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设置生态要素的衡量标尺,即以解决人与自然关系异化问题、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为目标,避免将掠夺自然、破坏自然视为文明发展的必要代价,超越近现代工业文明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昭示人类文明新形态维护生态正义、倡导生态伦理的价值追求;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明确人类文明形态具体要素运转的保障条件,既有利于认识和处理人类文明新形态同外部世界其他文明和谐共生的关系,又开辟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摒弃对外扩张掠夺的新路。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⑨。

最后,人类文明新形态准确把握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现实存在形式。众所周知,当人类文明形态构成要素建立并保持整体有序的和谐状态时,人类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文明形态就能逐步提高、渐次丰富,最终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从“四个现代化”瞄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到“两手抓”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到先后提出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三位一体”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再到协调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日益清晰,并以此为指导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概而言之,“五个文明”协调发展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从全局考虑问题、谋划思路的重要内容和机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把握文明形态发展整体性、结构性等特征的基础上,既充分发挥物质文明提供必备物质条件、政治文明提供制度支持和法律保障、精神文明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社会文明提供社会秩序和社会力量、生态文明提供环境条件和丰富资源等单个部分的基础性支撑,又力争达到“五个文明”协调发展促进物的全面丰富、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整体功能最优的行动策略,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具备更加清晰明确的认识,对于建设什么样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怎样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具备更加切实可行的思路。

第二,就人类文明形态发展过程的四种形态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在主体社会形态的维度上,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处于由物的依赖性文明加速转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文明的阶段。其一,与人的依赖性文明相比,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完全跨越了人的依赖性文明。其二,与物的依赖性文明相比,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批判以资本为本位的文明形态的历史局限性,警惕“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⑩的人的异化现象,摒弃以资本增殖为主导的发展逻辑,在改善人的生活状况、保障人的发展条件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本质上已经明显不同于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仍处于物的依赖性文明的状态。但由于生产力发展程度的限制,人类文明新形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程度尚显不足,没有完全超越物的依赖性文明,仍然需要利用资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三,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文明相比,人类文明新形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通过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实践活

动,为超越物的依赖性文明的暂时阶段、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文明的最终目标创造条件和积蓄力量。概而言之,人类文明新形态处于物的依赖性文明转变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文明的关键节点,正在加速驶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文明的“彼岸”。

其次,在经济社会形态的维度上,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处于社会主义文明相较于资本主义文明日益展现出明显优势的阶段。应当肯定,资本主义现代化开辟的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历史进步作用,曾经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进步形态,“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④,资本主义文明“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⑤。但不可否认,资本主义文明在理论上包含着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在实践中暴露出物质主义膨胀、贫富分化悬殊、社会冲突频繁等诸多弊端。与之相反,人类文明新形态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实践,坚定地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展现出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优越性,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其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成果,人类文明新形态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打破资本主义文明内在对抗性的困局,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就其质的规定性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而不是别的什么文明形态,必然具有相较于资本主义文明的优越性。其二,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仍处于“进行时”时态。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⑥,因此,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联系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虽然属于社会主义文明,但还远未发展成熟。所谓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

态,并不意味着创造过程已经结束、创造成果完全定型,而是指人类文明新形态初步形成,其相较于资本主义文明的优越性并非“完成时”,而是将通过长期的历史过程逐步呈现出来。其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正迈向“加速度”时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人类文明新形态将进入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任务,人类文明新形态相较于资本主义文明的优越性将加快展现出更丰富的内涵和更清晰的指向。

再次,在技术社会形态的维度上,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处于工业文明发展演进至数字文明的阶段。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形态大体上呈现出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再到工业文明的演变历程。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后,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电器的广泛应用、信息科技等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三次工业革命推动生产力变革,开启了工业文明的主要历史阶段。习近平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⑦,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工业文明的发展轨道上演进至数字文明的新阶段。其一,从整体趋势来看,数字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演进方向,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走向数字文明的发展阶段。纵观世界文明,“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以‘大数据’为标志的新时代”^⑧,无论是人类文明新形态,还是其他文明形态,大都处于迈向数字时代的共同轨迹,能否把握数字文明的发展契机,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技术形态维度上冲刺比传统工业文明更高的文明阶段的关键。其二,从技术应用来看,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广泛应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人类文明新形态将建立在高度发达的数字技术以及产生深刻影响的数字文明基础上。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技术嵌入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不意味着人

类文明新形态抛弃其他的文明形态构成要素,数字文明既可以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数字化表现形式,也可以是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相提并论的独立形态。其三,从现实任务来看,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后期,还没有整体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已完成的现代化任务,人类文明新形态必然需要充分发挥数字化的动力作用,开辟“并联式”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数字化路径。也就是说,数字文明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新四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基本实现具有数字文明特征的“新四化”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的基本路径,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高度自动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整体性变革将掀起文明形态的大变革,人类文明新形态将在“新四化”的数字化发展战略中持续创造、实现跃迁。

最后,在交往社会形态的维度上,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处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世界文明多样性深度融合的阶段。从历时性看,无论将人类历史曾经存在、至今仍然存在的文明形态分成哪些,中华文明始终是不同的文明形态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共时性看,无论将人类历史上任一时期或任一时代的文明形态分成哪些,中华文明始终是其中具有较强开放性的文明形态。其一,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植根于中国大地上的新型文明。人类文明形态是连续累进的,新文明形态还须从旧文明形态的土壤中生长起来。人类文明新形态传承和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是在中华文明深厚养分滋润及其现代转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有其清晰可循的历史脉络。其二,从融合世界文明的角度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由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人类文明新形态秉持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

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①。在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的路径上,人类文明新形态突破“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话语陷阱,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在实质意义上超越单一文明的理论资源和文化传统,真正运用人类文明的共同智慧解决世界性问题。其三,从赓续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文明。在理念上,人类文明新形态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实践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总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具有高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特征的重大原创性论断和标识性概念,是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可供发掘的理论富矿。但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作为尚待深度开发的学术领域,其学理阐释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需要经历长期艰巨的理论建设过程。未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立足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实践及经验,多领域、多角度、多学科验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逻辑和道义逻辑,有效回应人类文明新形态如何体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何推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等重要议题,超越西方文明理论的解释框架和话语体系,彰显中国主体性的知识创新和理论创造,应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责无旁贷的重大使命和努力方向。

注释: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7页。

②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载于《求是》2022年第14期。

③相关讨论参见孙进己、干志耿《文明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9-254页。

④[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坦等《世界文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6页。

⑤[美]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天地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190-191页。

⑦[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⑧参见[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34页。

⑩[法]涂尔干《涂尔干文集》第10卷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510页。

⑪[法]基佐《法国文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9页。

⑫[法]基佐《法国文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0页。

⑬[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

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34页。

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2卷第84页。

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125页。

⑰[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5卷第494页。

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4卷第287页。

⑳[俄]霍米亚科夫、赫尔岑等《俄国思想的华章》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104页。

㉑[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6页。

㉒[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㉓[英]阿诺德·汤因比《文明经受考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129页。

㉔[美]菲利普·巴格比《文化与历史：文明比较研究导论》

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84-195页。

㉕[美]马修·梅尔科《文明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22页。

㉖[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43-604页。

㉗[美]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41-830页。

㉘[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7页。

㉙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2-74页。

㉚[美]索罗金《论汤因比的历史哲学》，载于《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1年第3期。

㉛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009年版第52页。

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2卷第3页。

㉝《斯大林文集》1985年版第222页。

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35页。

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404页。

㊱《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43-544页。

㊲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㊳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7页。

㊴《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53页。

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415页。

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405页。

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2009年版第927-928页。

㊸《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363页。

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06页。

㊺秦宣《大数据与社会主义》，载于《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5期。

㊻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7页。